

现代化： 抗拒与变迁

[以] S·N·艾森斯塔德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现代化:抗拒与变迁

[以]S.N.艾森斯塔德 著

张旅平 沈 原 陈育国 迟刚毅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Modernization: Protest and Change

by S. N. EISENSTADT

1966 by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 J.

据恩格尔伍德 克里夫斯 普林泰斯 - 霍尔出版公司 1966 年版译出

现代化: 抗拒与变迁

(以) S. N. 艾森斯塔德 著

张旅平 沈原 译
陈育国 迟刚毅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 39 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石桥胡同 6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x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 6.125

1988 年 4 月第 1 版 198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47 000 册数: 1-12 000

*

ISBN 7 - 300 - 00223 - 4

C. 10

定价: 1.80 元

序 言

本书通过分析现代和现代化社会的主要特征与问题,试图对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问题进行社会学的探究。其重点指出,急需产生一种能不断“容纳”各种内在于现代化过程之中的社会变迁的制度结构,以及在各种社会都能发现的形成这一结构的各个方面的能力,是现代和现代化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本书还极为注重对比产生现代化“崩溃”或“倒退”的状况,来了解现代和现代化社会产生上述那一制度结构的条件。

然而,这种分析必须正视现代社会结构多样化的实情,这种多样化之间可能相互联系的方式,以及持续发展的条件与崩溃的条件对比的假设。因此,本书第二部分分析了在某些现代和现代化社会已产生的种种现代化模式。这一分析必然是提纲挈领式的,而且仅含有少量有关历史和当代背景的知识。它试图提供某种见解,以便能够对研究此类社会的专家以及对比较分析感兴趣者有所裨益。

本书并非自命对它所提出的许多问题都给予了解答。其主要目的之一是提出问题,并且仅仅表明一种更为合理的解答(它远胜过本书所给予的尝试性解答)的开始,以便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本书是我长期关注现代化问题及其发展的水到渠成之物。我仍在持续不断地考虑,它有望导致对现代化问题各个层面的更详尽的分析。

这种关注之发展的最重要阶段可能是在1962—1963年之间。当时我是麻省理工学院卡内基政治学客座教授。正是在那

里,通过我与 H. 艾沙克斯、D. 勒拿、白鲁恂、I. d. 素拉普尔、M. 维纳、R. 伍德,以及哈佛同仁,尤其是 T. 帕森斯和 R. N. 贝拉的交往,才逐步奠定了本书的方向。

在对现代化问题的一般性研究中,尤其是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最须感激的是 E. 希尔斯。他在该方面的著作对我的写作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本书所使用的某些重要概念,如“谐同的大众社会”和“中心与边缘”,实际上是由他始创的。此外,他还十分详尽地审阅过本书的若干部分,并极大地增进了其中的内容。

我还要感谢哈沃福德学院的 A. 戴曼教授、伦敦经济学院的 E. 盖尔纳教授、希伯来大学的 M. 康菲诺教授和 J. 卡兹教授、加州大学伯克来分校的 N. 斯麦尔塞教授。他们都阅过本书的稿本,提出了非常有益的批评。再有,对于 R. 巴-约瑟夫博士看过部分手稿以及 R. 莎可夫人在校对上的帮助,这里也一并致谢。

有关我在从事现代化方面的大部分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自始至终都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在此特表谢意。

S. N. 艾森斯塔德

目 录

第一章	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1
	背景	1
	社会动员与社会分化	2
	持续的结构分化与变迁	6
	组织系统与身份系统	8
	政治领域	13
	现代社会的大众谐同趋向	17
	教育领域	19
	现代化的国际概况	21
第二章	现代化中的社会解体、变革和抗拒	23
	社会的变迁、解体和结构脱节	23
	社会解体的后果	25
	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	29
	青年问题模式的变化	30
	结构变迁与抗拒取向	35
	社会抗拒的主题	36
	文化抗拒的主题	38
	抗拒的国际概况	40
第三章	现代化中的结构变迁、结构的多样性和持续 增长问题	41

	抗拒取向、结构变迁与整合问题	41
	容纳变迁的制度的发展	43
	体制变革和持续增长	46
	结构的多样性	49
	不同的历史起点和现代化中的精英的取向	53
	结构的多样性和持续增长的条件	56
第四章	现代化第一阶段的模式	59
	导言	59
	西欧、美国及英国自治领的持续和多元化的	
	现代化模式	63
	现代化中的精英和取向	63
	现代化的时序和结构特征	67
	多元立宪政体对变迁的容纳	68
	抗拒运动与骚乱的模式	70
	法国和意大利:若干比较研究	75
	现代化在西欧以外地区的扩展	77
	分裂型现代化的产生	77
	独裁政体:德国和俄国	80
	分裂型现代化的时序和结构特征	83
	容纳变迁的模式	84
	抗拒取向与骚乱的模式	85
	日本的现代化进程	87
	革命寡头统治下的现代化	87
	现代化的时序和结构特征	90
	政治进程与容纳变迁	92
	30年代日本体制的崩溃	94

第五章	现代化第二阶段的模式	96
	现代化第二阶段的社会特征	96
	拉丁美洲的现代化模式	97
	初期模式	97
	结构变迁与结构的二元性	100
	精英的组成与结构的二元性	105
	结构的二元性与崩溃	109
	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差别	112
	革命民族主义政权和共产主义政权	114
	革命政权的共同特征	114
	民族主义——革命政权的结构特征	119
	日益增长的分化与抗拒的新取向	121
	共产主义政权的具体特征	123
	容纳变迁和抗拒的取向	124
	殖民地社会的变革	127
	殖民列强最初的现代化取向	127
	殖民地社会中的不均衡变迁	130
	不均衡的变迁在政治领域中的影响	131
	现代化态度的转变	134
	中心与边缘的基本结构特征	135
	分层与意识形态	138
	整合的主要问题	140
	新兴国家之间的若干主要差异	145
第六章	崩溃与持续增长状况的比较分析	150
	现代社会骚乱的普遍性	150
	骚乱的可能后果	151
	崩溃状况的特征	155

抗拒的运动	156
沟通的程序	157
精英之间的分裂	158
契约安排与约前的象征	162
持续增长状况中的政治演进的特征	165
第七章 初步的结论:崩溃与持续增长的条件	168
导言	168
精英与广大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	170
结构的弹性:政治领域	172
身份系统的僵化和弹性	174
结构弹性的若干条件	177
意识形态的转变和精英的凝聚力	179
精英在崩溃状况中的形成及其取向	183
译后记	186

第一章 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背 景

现代化以及追求现代性的热望,或许是当代最普遍和最显著的特征。今天,大多数国家均陷于这一网络之中——成为现代化的国家,或延续自己现代性的传统。随着现代化在全世界的扩展,它在不同国家中所具有的异同点便显现出来。而探讨和分析这些异同的特点则是本书的宗旨。

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它从17世纪至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其他欧洲国家,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

现代或现代化社会是从各种不同类型传统的前现代社会发展而来的。在西欧,它们发轫于有着兴盛的都市的封建或专制国家;而在东欧,它们则来自高度独裁而低等都市化的国家与社会。在美国和英属第一批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它们是经由殖民化和移民过程而形成的。其中,有的源于强烈的宗教动机,并由宗教的拓殖团体所组成,而其余的则多半基于大规模的移民,目的在于寻求经济良机 and 更大的地位平等。

在拉丁美洲,较为支离破碎的现代结构出自寡头政治的殖民征服社会。在该社会中,居征服者和寡头地位的白人与土著臣民之间存在着强烈的隔阂。在日本,现代化过程起源于一个略具特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而在中国,它则是在一个人类历史上

最悠久的帝制，即一种基于特殊类型的“文士—官僚”制度崩溃后形成的。

在大多数亚洲和非洲社会，现代化过程始于殖民体系之内。其中一部分（尤其在亚洲）以原有较为中央集权的君主制社会和完密的文化宗教传统为基础，而另一部分（特别在非洲）则主要建立在部落的结构与传统之上。

正如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这些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同的起点，极大地影响着这些社会发展的具体面貌及其所遇问题。然而，除了这些差异外，还产生了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或许构成了现代社会“现代化”的主要核心，而对此加以分析则是颇为值得的。

社会动员与社会分化

K. 道易治 (Karl Deutsch) 创造了“社会动员” (social mobilization)^① 这一术语，用以表示社会—人口层面的现代化。他对社会动员所下的定义是：“人们所承担的绝大多数旧的社会、经济、心理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的过程；人们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同时，他还指出了社会动员的某些主要指标，其中包括：由机械、建筑物、消费品等所表现的现代生活层面，对大众媒介的反应，居处的变化，都市化，转离农业，识字率，人均收入的增长，等等（当然，这些指标本身并不表示以此种方式所获得的资源是否确实得到了利用）。

就个人活动和制度结构而言，现代社会是高度分化和高度专门化的。组织成员的录用在具有现代特征的社会并非由任何固定

^① 参见 K. W. 道易治《社会动员与政治发展》，见《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 55 号（1961 年 9 月），第 495—496 页。

和先赋的血缘关系、地方种姓，或等级结构所决定。专门人才是“自由流动的”（即角色的获得不决定于个人的先赋特性）。同样，财产和权力也不按先赋的方式来分配——至少不象在非现代社会那样严重。这种现象主要同经济生活中的市场、政治中的选举和政党活动，以及大多数机构所采用的录用式科层组织方式与机制有关①。

在所有主要的制度领域，这种角色分化和专门化的最重要方面可能就是个人所扮演的各种角色的分离，尤其是职业角色与政治角色，以及这些角色与家庭和血缘关系角色的分离。这种分离首先（也许是最富戏剧性地）于工业革命时期在家庭与经济职业角色之间产生。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对工业革命与工业制度的研究、滕尼斯在对“社区与社会”的研究，以及齐美尔（G. Simmel）在对都市生活的研究中，都已充分描述过②。

首先，这种角色的分离意味着，在一个制度领域内（如在职业领域内）任何一个特定角色的获得并不自动地带来政治和文化领域特定角色的占有。

其次，在任何一个制度领域里（在经济、政体、社会组织，等等领域内），环绕着自己特有的目标还会产生各种不同性质的单位，它们不象在那些比较传统的社会中那样，会与任何以家庭、血缘和

① 关于现代化方面的论述参见：T. 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演变》（纽约，格伦科自由出版社 1957 年版），第三章和第四章；D. 勒拿《传统社会的消失》（纽约，格伦科自由出版社 1958 年版）；B. F. 哈赛利兹《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载《美国经济学评论》，第 47 号（1957 年 5 月），第 28—71 页；J. A. 凯尔《伴随工业化和都市化而来的若干社会现象》，载《人类组织》，第 18 号（1957 年夏），第 53 页—75 页。

② 参见 G. 齐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载 P. 哈特和 A. 瑞斯合编《城市与社会》（纽约，格伦科自由出版社 1957 年版）；F. 滕尼斯《社区与社会》，英译本（伦敦，1955 年版）。

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另外种类的群体相融合。

在纯粹经济领域,这些演变具有(以牛顿以来的科学为基础的)高度工艺技术发展的特征,并为知识的系统运用(知识的寻求已成为专门科学机构的活动范围)以及与初级的天然物生产业相区别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工商业和服务业)所推动。换言之,这些演变表现为一种工业体制的发展,而其又是以高度工艺技术、经济角色和经济运行单位——生产、消费、交换的日益专门化,以及产品、劳动力、金融市场的日益扩大和复杂化为基础的^①。

在政治领域,现代化首先表现为疆域的日益扩展,尤其是表现为社会中心、法律、行政和政治机构的权力之强化。其次,它还表现为潜在的权力不断向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内扩展,直至它最终落入所有成年公民之手,从而使社会形成一个和谐的道德秩序。

第三,就某种意义而言,现代社会是民主的社会,或至少是平民主义的社会。其特征是,以社会的外在力量(如神、理性)来使统治者合法化的传统在衰弱,而统治者对那些被认为持有潜在政治权力的被统治者,则负有某种意识形态的、通常也是制度化的责任。

当然,所有这些特征都与下列现象相关:政治支持者有较大的流动性,注重“利益取向”和非意识形态的政治效忠,以及对任一统治者或群体进行先赋性的政治献身急剧减少,或有时几乎是全部消失。因此,为了有效地保持自己的权力和获得对于所宣传的特定目标及意欲推行的政策的支持,统治者自知必须通过选举、公民投票和代表们的欢呼不断地寻求被统治者的政治支持,或至少是

^① 参见 W. 莫尔《经济发展的社会框架》,载 R. 布雷邦迪和 J. 斯宾格勒合编《传统、价值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达拉谟,杜克大学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57—82 页。

大部分人的口头支持^①。

与传统专制政体的统治者不同，极权主义政体的统治者承认其国民是受益的对象和使政策合法化的主体。现代民主或半民主体制与极权主义体制间的区别，并不一定在于它们对其信仰是否真诚，而在于它们在政治组织的多元化、公民自由和文化、福利政策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程度^②。

在文化领域，现代社会的特色在于宗教、哲学、科学等主要的文化及价值体系之日趋分化，识字和世俗教育的普及，以及以更为复杂的智力组织系统来培养和优化专门的智力角色^③。

这些发展既同沟通媒介的扩展、以及主要沟通媒介日益向广大的社会团体渗透紧密相关，又与这些团体更为广泛地参与居主要地位的文化精英所开创的文化活动和组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④。

这些发展的高峰，就是一种新型文化观的形成——这也许是现代化最富有渗透性的一面，尽管这一新文化观在现代社会的扩展和传播是断断续续的，十分不平衡的。新型文化观的特点在于它注重进步、改良、幸福、能力与情感的自然表现，强调个性是一种

① 参见 S.N. 艾森斯塔德《官僚制与政治发展》，见 J.L. 波拉姆巴哈编《官僚制与政治发展》（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96—120 页。

② 参见 S.N. 艾森斯塔德《政治现代化：若干比较评论》，载《国际比较社会学杂志》，（1964 年 3 月）第 5 号，第 3—24 页。

③ 参见 E. 希尔斯《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载《历史与社会比较研究》（1960 春—夏合刊），第 265—292 页和第 379—411 页；K. 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伦敦，1940 年版）。

④ 参见 K. 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伦敦，1940 年版）；L. 派伊《沟通与政治发展》（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3 年版）。

道德价值,同时也强调个人的尊严,讲求效率^①。凡此种种均可由某些新的人格取向、品性和特征的形成而表现出来,其中包括:对日益广阔的社交圈有较大的调适能力;“自我”具有一定程度的弹性,兴趣更形广泛;与他人和其他境遇移情的潜力不断增强;对自我促进和流动有日增的估价;以及日益强调人生短暂,乐当及时^②。

持续的结构分化与变迁

在社会的发展中,向现代性前进需经历若干特定的阶段。以政治领域而言,在现代政治体制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问题将逐次在政治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不同类型的政治组织也将逐次出现。在现代化的某些阶段,选举权、新政治共同体的界定及其独立等问题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在其他阶段,宗教信仰自由和所谓文化的世俗化就成为最显著的问题。而到了又一其他阶段,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便成了最为切要的方面。在这些问题中,每一个问题的产生都与不同的新群体和阶层登上政治舞台有着必然的联系。

同样,新型的政治组织也在不断地出现。一方面从小的议会派系、各种相对局限但又充分结合的利益集团中,另一方面又从不同类型的社会运动中产生出更为充分组织化的政党,即大众政党。尔后,特别是在本世纪 20 年代末期以来的欧洲和美国,这种政党以及为其所左右的立法机构的相对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都

① 参见勒拿著作,见前注。

② 参见 E. 希尔斯著作,见前注;A. 英克尔斯《从事工业的人:身份与经验、感知和价值的关系》,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 66 号(1966 年 7 月),第 1—31 页。

有所降低。这一方面导致了规模庞大、组织完善的利益集团的出现,另一方面又使政府的行政和管理部门,尤其是大规模的科层式管理系统的重要性日益增强^①。

在经济领域,我们看到较小规模的生产单位,如家庭商行、小工厂和在有限的地方市场上营运的商业和银行业,转变为较集中、较科层化的庞大生产单位,如在更为包罗万象的、规模的新市场中营运的大公司、托拉斯、卡特尔。同样,对经济发展结构具有特大影响的新型生产技术也不断产生。这一方面导致各单位内的劳动分工日益增加和多样化,另一方面又引起了整个市场结构的不断复杂化^②。

在职业体系方面,我们首先看到新种类和新群体的不断出现。在现代化的最初阶段,相对而言,职业结构可以说并不复杂,其构成多为各种非技术性和技术性的手工职业,少数为“中产阶级”的职业,如商业和制造业,以及在人口中占有极小比例的较为传统的职业,如宗教、军事、法律、医疗等方面的职业。以后,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每一种职业又分化出许多亚种。此外,还出现和增加了许多新的组织和职业种类,如福利、服务、科技与管理方面的组织和职业^③。

这种崭新而更为复杂的生产单位的发展(其中每一单位内的不同类型的职业人员,即技术专业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数量也在增加),还促进了新的专门职业和机构的兴起。它们不再只限于传统的职业范围,如法律和医疗业等,而是扩展到其他职业种类,如科技研究、护理、社会工作、以及公共事业管理等职业。在多数这类

① 参见希尔斯著作,同前注;艾森斯塔德著作,见前注。

② 参见 W.E. 莫尔《工业的影响》(卡利佛斯,1965 年版);C.S. 毕尔霍《传统交换与现代市场》(卡利佛斯,1965 年版)。

③ 参见帕森斯著作,见前注。

职业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日益专业化的趋向,其一方面要求更高的教育资格作为就业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又倾向于各组织实行自主管理。这些发展都趋于消除或减少不同职业间的许多较为古老的差别^①。同时,它们还引起了新式工会组织的不断产生和不同模式的劳工关系的形成。从比较简单,多半限于一厂、一地、或一个工业部门的工会,逐步发展出以不同联盟形式组成的全国性的工会组织。这种发展也延伸到白领和蓝领职业之中,各自产生了新的问题和要求。于是,不同的生产或消费单位间的关系便与各单位内次群体所组成的新组织间的、日益增加的横向联系和义务交织在一起。

在人口—生态方面,我们亲眼看到,那些小的地方性农村和城市单位,无论其既定人口是多少,本来能够在较狭小的生态环境内基本上自给自足,而今却已有着日渐衰落的发展趋势。

居住、工作、就学、娱乐等方面的功能的发挥,越来越分散在不同而相距遥远的生态区域里。同时,许多新的、生态的次级单位所赖以产生的大都会地区也形成了^②。

组织系统与身份系统

现代社会的组织结构特征是:第一,具有明确而具体功能的组织众多;第二,此种组织与团结性强或具有文化取向的社团之间分工明确;第三,一方面,在专业组织内血缘关系和狭隘的地缘基础的重要性在减少,另一方面,各类“特殊化的”组织和宽泛的先

① 参见莫尔《工业的影响》。

② 参见 D. V. 格拉斯《文明变迁中的市镇》(伦敦,1935 年版);辛莫尔著作,见前注;L. 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见哈特与瑞斯合编《城市与社会》,第 46—63 页。